

言语行为理论与实践^{*}

——以中英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语料为例

尚晓明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本文针对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阶段运作机制, 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取效行为理论框架, 这一阶段被言语行为理论界定为以言取效阶段。该理论框架旨在阐述语言和可预料效果、知识和不可预料效果、行为和探试效果之间的关系, 有益于建立目的性现象的整体理论。

关键词: 语用发展; 以言取效阶段; 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075-6

Speech Act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 An Illustration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Preschool Child Pragmatic Development Data Analysis

Shang Xiao-m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This essay has propos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perlocutionary act which is feasible to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preschool child's pragmatic development stage delimited by the speech act theory as perlocutionary act stage, which mainly expound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utterances and expected effects, knowledge and unexpected effects, acts and heuristic effects, and which ultimately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tary theory of teleonomic phenomena.

Key words: pragmatic development; perlocutionary act stage; theoretical framework

1 引言

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指学龄前儿童习得和运用适当的言语形式表达自己的言语意图或在一定语境中达到自己的交流目的的方式(Hoff-Ginsberg 1997; Ochs & Schieffelin 1979; Crystal 1976)。从国内来看,国内对此研究起步较晚,周兢(2002)和刘森林(2007)等人发表了有关儿童语用发展方面的文章。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学龄前儿童语用技能发展研究的进展、学龄前儿童的语用特征等领域。局限性在于研究对象大多停留在语法层面上,诸如音位学、形态学和句法学层面(刘森林 2007: 9)。就国外而言,1979年,美国《发展语用学》问世。Crystal(1976)主张学龄前儿童语言研究应从传统的语法层面转向语用层

面。Ninio & Snow(1996)把语用能力发展习得看作社会化发展过程。Peccei(2000)介绍了儿童语言发展理论,但没有涉及儿童语用学内容。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学龄前儿童言语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尚存不足。本文旨在通过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研究补充和发展言语行为理论。

2 儿童语用发展语料特征分析

笔者依据交际类型标注及其标注功能解释表和言语行为类型表(<http://childes.psy.cmu.edu>)通过分析发现,社会交际层面可分为:(1)以目的为导向(a goal-directed action),说话人和受话人共建儿童话语意义;(2)关注受话人非言语交际行为;(3)明确说话人和受话人无法被观

^{*} 本文系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中英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语料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10D018)和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话语建构与透视研究”(10542006)的阶段性成果。

察到的思想和情感; (4) 明确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情形中的情感表达如感谢、抱歉和安慰他人; (5) 明确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关注的事物、人和活动; (6) 讨论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话题; (7) 对活动中的步骤实施、角色分配进行协商 (negotiating); (8) 通过协商进一步明确物权关系; (9) 通过动态协商创造共同关注和高度合作的氛围; (10) 明确无法识别和难懂话语的真实意义; (11) 进一步理解说话人或听话人的自言自语; (12) 探索体现文化结构和概念结构认知操作过程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世界, 展现其暗示行为、启发思想、处理问题等语用功能, 实现以虚代实, 传递交际意图的语用目的; (13) 在语言游戏中生成适宜的话语形式。使用语言如同进行游戏一样, 必须遵守语言规则方能进行, 不同的规则确定了不同的语言游戏。这些规则不仅包括日常语法, 还包括使用语言的语气以及与此有关的行为等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 这些言语行为构成基本的语言游戏, 其核心在于正确地遵守规则。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各种语言游戏, 通过约定, 形成我们所处的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即我们所接受的一切, 亦即我们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言语行为层面大致可分为要求、话语模仿、承诺、宣告、情感表达、声明、提问、施为句、评价、澄清话语、文本纠错和语音识别。社会交际—言语行为结合层面或语用灵活层面 (level of pragmatic flexibility) 揭示了交际行为生成靠的是社会认知、语言知识和以约定俗成、情感、礼貌的方式表达交际意图的能力, 所以, 儿童表达交际意图能力的发展体现了他们认知能力、语言技能和理解社会能力的提高。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首先, 对研究者和儿童话语互动进行录音, 将有声记录用 CHAT (Codes for the Human Analysis of Transcripts) 转写, CHAT 是儿童语言交际系统 (CHILDES) 的一部分。其次, 根据 INCA-A 标注系统进行标注。最后, 通过 CHILDES 得到 CLAN (Computerized Language Analysis) 软件, 对标注的语料进行计算和分析。就定量研究而言,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 基于 3 个层面交际行为类型的使用数量和频率不断增加, 而定性研究发现儿童社会语用能力 (sociopragmatic ability) 的发展快于语言运用能力 (pragmalinguistic ability) 的发展, 并关注新的交际行为类型是如何产生的。

3 取效行为及其理论框架

人们对取效行为的研究多停留在行为的效果方面, 对目的和效果的区别, 对可预料效果 (ex-

pected effects)、不可预料效果 (unexpected effects)、探试效果 (heuristic effects) 的区别尚未展开系统研究。劝说某人做某事或从目的出发劝说某人做某事被视为典型的取效行为, 劝说 (inducing) 是句子最典型的超级目的 (supergoals) 之一, 就目的而言, 它既可以通过语言手段来实现, 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手段来实现。取效行为不仅包括符号发出者的目的、符号的社会和生物功能、说话人与听话人相互接受目的 (语言的、非语言的) 并以此进行调整的行为 (目的、超级目的) 和知识 (目的、超级目的), 而且包括行为的效果。行为的效果可以是可预料的, 也可以是不可预料的, 甚至是探试的。由于高度知识共享和高度合作态度等语用因素和具体任务目的现实凸显性 (saliency) 有机结合生成策略文体 (strategic style), 儿童语用发展过程中取效行为的效果被界定为显性取效 (explicative perlocution)、隐性取效 (implicative perlocution) 和受动取效 (evocative perlocution)。可预料效果分为显性取效, 体现在感知 (perception) 和话语解码 (linguistic decoding) 过程中; 不可预料效果分为隐性取效, 靠的是记忆中的假设 (assumptions) 和假设图式 (assumption schemas); 探试效果分为受动取效, 基于人类演绎机制 (the human deductive device) 的应用与实践, 透视儿童的游戏与成长、学习与成长过程, 以社会互动理论 (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 及行为和目的理论 (a general theory of acts and ends) 为基础, 关注非语言行为为目的和超级目的对产生效果的影响。

Bates, Camaioni 和 Volterra 继 Lock (1972) 和 Shotter (1974) 之后对意向性进行了研究, 他们认为儿童话语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构建, 而不是说话人或听话人一方决定的, 如果用言语行为理论来划分, 他们将这一语用发展阶段称为以言取效阶段, 这里的以言取效意味着话语对说话人和听话人产生效果, 它也许被理解为侮辱、威胁或恩惠等。当儿童用象征手段传递意象时, 他们把这一阶段视为以言行事阶段。当儿童用语言来表达命题时, 他们把这一阶段视为以言指事阶段。取效行为理论框架基于目的和效果的互动关系, 各成分之间互为关联。本文主要阐述语言和可预料效果、知识和不可预料效果、行为和探试效果之间的关系。

3.1 语言 (目的、超级目的) 与可预料效果

行为被视为目的活动 (a teleological activity), 克服意向概念理论中的不足, 将两种目的有机结合: 一种目的是用心智调整行为, 处于意识状态的

意向作为子系统,属于进化论范畴;另一种目的是作用于心智的生理或社会功能,属于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和文化进化范畴。行为的目的是对行为的调整至关重要,除非把行为看作是受目的约束的(goal-governed)、最终的行为(a finalistic activity),否则它不能被理解。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接受”或“采纳”(adoption)目的并以此目的调整具体任务目的,以达到可预料效果。在实现可预料效果过程中,语用因素和具体任务目的相结合生成策略文体即显性取效,它代表对话语的感知和话语解码两个过程,对话语的感知和话语解码既来自语用因素又来自语言的目的和超级目的。根据塞尔(Searle 1975:26)的概括总结,理解间接言语行为主要基于理解句子超级目的的机制和能力。这里所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而是言语行为所拥有的超级目的普通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supergoals)。更宽泛地讲,普通行为中所拥有的超级目的理论(a theory of the supergoals)。例如,假设 Larry 想和 Linda 单独待在一起,他对 Linda 的弟弟 John 说:

① 我有一套新买的拼图在屋里,你去拿吧。

这一言语行为具有显性的双重目的:

目的 1: John 应该知道 Larry 要他去拿拼图;

目的 2: John 应该去拿拼图。

这一言语行为拥有一个超级目的(supergoal):

超级目的 1: Larry 留下来单独与 Linda 在一起。

“让他们独自在一起”是一个间接请求,在这一语境中,“让他们独自在一起”是主要言语行为(a primary speech act);“去拿拼图”是次要言语行为(a secondary speech act)。(Searle 1975:59-82)这一间接言语行为表明:John 不仅仅理解 Larry 的超级目的,而且他知道 Larry 需要他的理解,所以他支持 Larry。这就是为什么超级目的结构与间接言语行为结构相同即一种言语行为通过另一种言语行为来实现。

目的又可分为内心目的(internal end)和外部目的(external end),可预料效果中的感知和话语解码体现了显性取效,体现了对内心目的的感知和对外部目的的话语解码过程,在理解行为意义过程中,二者缺一不可。通过信号的交际,目的的一定是外部的、功能性的。如果目的是内心目的,那么人的心智就会产生交际目的,为了达到心智间的交流与沟通,人们通常用符号来进行交流。听话人能深入了解说话人的内心目的意味着说话人具

有体验听话人的心智、体验听话人内心目的的能力。所有个人心智目的间的沟通和所有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s)交流二者的有机结合,至关重要。假设这样一个情景:乙在倒车时没有看到甲,甲通过鸣笛告知乙,完成了鸣笛传送的信号功能,乙有可能停下来也有可能没停下来。这一过程来自于外部目的,是功能性的,是人的社会性、生理性反应。同样,在话语交际中,只是以让他人知道为目的的交际是远远不够的,需以共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为背景,编织心灵的纽带,唤起他人的交际欲望,双方的内心目的与外部目的有机结合(both ends are goals),在互动的基础上,才会实现心灵的沟通。

3.2 知识(目的,超级目的)与不可预料效果

所有知识具有目的功能(all knowing has a functional purpose),它体现知识的整体性超级目的和阶段性目的特征。知识具有生命力,不被束缚在静止的或机械的模式中。如果知识被概念化成为概念主体和事物之间的建构机制,我们就需要一个概念来表达这个建构关系,皮亚杰提出“平衡”(equilibration)概念:建构性的、动态的平衡,而不是静止的平衡(equilibrium)。前者指的是事物对构思图式的同化(与概念主体的接触)和对事物的图式调节(与事物的接触)之间的平衡,同时,构思图式不是孤立地产生作用,而是与其他构思图式相互关联。例如,对约翰而言,“老师”这一概念与“成人”、“父母”、“警察”、“医生”等有关。平衡作为智力发展的机制。人类心智的特点就是有一种整体倾向在构思图式之间和构思图式子系统内部追求平衡一致(consistency)。“一致”和“不一致”并不是对立面或矛盾体,而是智力发展过程中并存的两个视角,这种平衡一致是在知识的超级目的框架中运作的。以成年人的视角,相对于早期对事物的理解不深,孩子般“幼稚”的不一致可视为阶段性地完成了一致,达到了知识的阶段性目的。因此,一个男孩假设(assume)汽车需加油才能开动比之前假设汽车只需要方向盘就能开动,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平衡作用于概念主体和事物之间(同化和图式调节)、构思图式之间和构思图式子系统内部(综合智力)。它也作用于所观察的事物和所推理的事物之间。当你看到照片上人们外出散步时挽起衬衫的袖子,通过推理得出夏天的炎热;如果你是一个气象专家,可能通过观察天气得出夏天的炎热。无论是通过观察得到的结果,还是通过推理得到的结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人采用观察

的方法,有人采用推理的方法,然而,观察推理平衡一致(observed-inferred balance)在心智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观察推理平衡也是肯定和否定的平衡,人们肯定事物用观察的方法,否定事物不用观察的方法,而用推理的方法。在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阶段,随着知识的增长,他们逐步实现知识阶段性目的向超级目的过渡。否定事物在心智生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每个概念可能涉及到否定成分。福特牌汽车被确认是因为其他牌汽车被否定。否定也是内心冲突之源,就像一致和不一致一样,平衡和冲突不是对立面,而是相互并存的。平衡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过程中,各种平衡得到建构,在重新建构各种平衡过程中,心智冲突得到补偿。在高度运转的思维过程中,冲突和补偿是经常出现的。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儿童习得知识的研究只停留在心理学研究层面,没有完全涉及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研究层面。认知心理学为儿童习得知识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通过整合研究,将不同环境习得知识的过程与认知和语言发展过程结合起来,更新了对皮亚杰心理学的认识。

皮亚杰理论独到之处在于(1)知识与行为等值(现实或潜在行为);(2)所有行为具有知识成分;(3)知识的基本形式是理解,与此同时,信息或现实知识是次要的;(4)严格意义上讲,记忆是次要机制;(5)与理解的基本知识相比,象征知识和语言知识同样是次要的,理解的基本知识既不存在于记忆中,也不存在于象征符号之中,而是存在于行为之中;(6)理论知识使象征符号得以体现包括语言、记忆和预期意象;(7)积极知识使知识得到更新、补充和发展,它与信息积累(学习)不同;(8)使知识得到发展的基本语境是富有激情、人与人之间的参与交流;(9)内心冲突不是外部施加的,而是智力发展过程中自发的和积极的运转状态(Piaget 1971: 42-43)。

我们认为(1)知识的基本形式是理解,与此同时,信息或现实知识(factual knowledge)同等重要,特别是现实知识;(2)记忆不是次要机制。记忆中的事实假设(factual assumptions)和假设图式(assumption schemas),从知识就是做事(knowledge is something to do)的角度,二者既与知识相关,又与行为紧密相连;(3)与理解的基本知识相比,象征知识和语言知识同样是重要的,理解的基本知识来源于记忆、象征符号和行为。以语言是存在之家园的视角,理解世界离不开语言知识,同

样,理解世界需要激活人生中的记忆、社会和文化象征符号,通过更深层次的理解,才能做到身体力行;(4)预期意象不仅属于理论知识范畴也属于积极知识范畴,它来源于现实世界又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丰富和发展;(5)内心冲突不仅仅来自智力发展过程中自发的和积极的运转状态,也来自外部世界。凭借大脑的运行过程或人的内在思维和感觉是不能研究心理学的,因此人必须要对外界的刺激做出行为反应。换句话说,我们天生就具有学习的能力,但是我们所学的依赖于我们生存的环境。

知识意味着做事(to know means to do something),知识通常是行为的客观结果。一方面,知识的整体性超级目的和阶段性目的有利于全面理解学龄前儿童话语意义,另一方面,我们要想知道不可预料效果的真实意义,反过来还需进一步理解知识的整体性超级目的和阶段性目的。知识图式(knowledge schemata)运作机制与隐性取效互为关联,在理解不可预料效果过程中,记忆中的假设和假设图式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往人们只注重预设(presupposition)概念,对假设(assumption)概念关注不够:前者为说话人单方进行的推测;后者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共同的推测,它不仅强调说话人的作用,也强调听话人的作用,它基于事实假设,来源于世界知识和生活世界。在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过程中,话语真实意义的生成,不仅来源于以言行事,而且来源于以图行事(do things with pictures),其中图的概念包括知识图式、生活世界中的图画、表征图式、认知图式(与社会互动的概念结构)。据统计,0至3岁的儿童就像使用计算机存储器一样,将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储存在大脑中,3至6岁的儿童使用的是照相机,有选择地将现实生活拍下来,储存知识。例如,有一天,小亮对妈妈说“妈妈是个王八蛋!”。妈妈感到非常惊讶,没有预料到孩子会讲这样的话。后来,妈妈从幼儿园老师那了解到,小亮有一天看到小强对老师说“老师是个王八蛋!”。于是老师一上午都在和小强谈话并且更加照顾他、呵护他。小亮想让妈妈陪他聊天,更加呵护他和照顾他,所以小亮才说出那样的话。

3.3 行为(目的,超级目的)与探试效果

行为(目的,超级目的)与探试效果运作机制是在更广泛整体策略框架中进行的,运用整体策略来理解行为的目的和超级目的。认知策略(cognitive manoeuvres)是人类演绎机制的具体体现,它作为假设随着高层策略或目的(higher level

goals) 不断地被激活,在不同的规划层面(planning levels)形成,可以被看作是达到行为目的和超级目的最佳手段(optimal manner)的认知体现(Zammuner 1981: 36)。在实现探试效果过程中,学龄前儿童需要依靠激活听话人从前的经历和语境、共同的现实假设、高度知识共享、高度合作、对伙伴的期望、对信息的需求、对行为目的和超级目的的理解。说话人和听话人以特定的方式激活具体策略(a given manoeuvre),实现受动取效,获得探试效果。就维果茨基的儿童语言社会性(mind in society)理论而言,儿童语言的社会化过程与话语信息建构过程中的听话人(看护人,老师,父母,同伴)角色密切相关,对儿童言语行为理论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双方在语言发育过程中同构言语行为类型。在言语交际中,对话语理解起主要作用的是构成双方认知环境的一系列假设,理解每一个话语所需要的语境因素是不同的,双方需在话语理解过程中为每一个话语建构新的语境。由于认知环境与认知结构不同,话语推理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隐含结论。以往只停留在语言层面的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存在不足,研究内容过于抽象、笼统,很多方面尚未涉及。目前的研究范围与视角应立足于行为理论(a theory of acts)、普通行为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acts)和社会互动认知理论(a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的研究。

在认知主体方面,如果只考虑目的(intention)概念,而不把基于控制模式(cybernetic model)、更加中性、更加灵活的目的(goal)概念考虑进来,功能概念就会令人费解。很多社会关系和现象存在于心智之外,即使它们作用于并贯穿于心智。但是把一切归于心智或者把社会关系和现象归于语码交际,功能概念中的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样,语言学、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也离不开社会关系和现象。就符号学而言,只靠与多样化事物结合并与之同化的语码(code)概念是不够的,原因在于:(1)规定意义属性的心智能力以个人经历或推理为基础;(2)意义属性具有社会和约定俗成的特征;(3)很多指称意义(significations)存在于社会之中。在这一交际范围内,我们所说的目的(goal)与我们经常使用的目的(intention)有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控制模式基础上、更加中性、更加灵活;后者是前者的子系统,主要指意识目的(the conscious goal)。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完成目的(goals)和功能(functions)的理论统一,实现目的和功能的有机结合。因为效果对

原因具有反馈,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对一些特征进行了选择,交际功能由此产生,当主体意识到这一功能或为此作出决定时,功能也就变成了目的,通过功能达到了目的。

行为目的和超级目的在话语生成前开始实施,尽管不能被直接表达,但它们对话语生成起作用。长期规划(long-term planning)不确定命题的具体意义,它是命题间连续的整体。言语表达(verbalisation)程度受语境限制如某一个语域或特定的言语表达,对其所作的决定属于短期规划(short-term planning),这既体现了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从事解决问题活动中对话语组织结构的选择又体现了对具体规划的选择,而这些又受策略的指导,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认知策略。

3.31 语义非连续性和认知策略

语义非连续性(semantic discontinuity)指说话人谈论的事物与已经介绍的事物相矛盾、不一致或相反,所谈论的事物也许是关于事物的状态、事件和性质等,这些语义非连续性及其不同类型是通过不同语言手段来表达的,语义非连续性甚至自相矛盾体现了某种策略目的,是让听话人接受相关信息,它是建立在双方的信念、高度知识共享、高度合作态度和相关语境的基础上。Levorato 和 Zammuner (Levorato & Zammuner 1984: 89 - 113)对儿童语义非连续性类型进行了分类:(1)对照(contraposition),如昨天正在下雨但不是今天;(2)混杂(complication),如我要出去但是正在下雨;(3)综合(integration),如外面正在下雨但是不太大;(4)整套推理(block of inference),如街道湿了但是没有下雨。这些语义非连续性类型是由意义相反“但是”连接的,体现了某种策略目的。Levorato 和 Zammuner (1984)对儿童自发生成个人叙事、神话故事(独白)、随意会话(对话)和主题会话(对话)进行了录音,录音时间分别为2到3小时,记录了整个话语生成过程。通过对儿童使用认知策略的分析得到结论:(1)年龄小的儿童在会话过程中很少使用语义非连续性认知策略;(2)一旦他们使用语义非连续性认知策略,并没有采取适宜的语言表达手段,而只是依靠简单的词组位置互换或并列连词“和”、“还有”等;(3)两个年龄组对综合和推理复杂语义非连续性类型的使用有所不同,年龄大的儿童主要使用综合和推理认知策略;(4)语义非连续性类型的使用与话语生成类型有关,这种关系在神话故事中表现得最明显。年龄大的儿童熟知叙事结构要求,通过对综合和推理认知策略的适当应用,充分

地实施话语规划。主题会话如论证性话语需要高层次规划和关于会话和语义限制等相关知识;(5) 语义非连续性类型与话语类型有关,年龄小的儿童在主题会话中,采用混杂和综合认知策略,年龄大的儿童在神话故事中采用推理认知策略、在主题会话中采用综合认知策略。

必要的认知能力和会话知识对认知策略的正确应用产生重要的作用,具体策略的激活和使用与语境和语境变项有关,说话人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受话人的信息反馈、高度的知识共享、为达到目的所面临的挑战、高度合作的态度和会话规则的一致等。给同伴讲故事时,孩子头脑中的现实假设与当他们给成年人讲故事时头脑中的现实假设不同,边绘画边随意交谈与课堂上关于生态学的讨论、制定旅游计划的讨论有所区别。通过约定俗成的手段(conventional means)表达说话人和受话人意象的能力是交际的关键。语言因素和说话人或受话人的伴随动作、情绪等非语言因素同构话语意义。Carter 对手势和元音化发音-感觉运动图式(sensorimotor schemata)进行了分析,发现儿童运用多种手段来表达和完成具体意象。儿童在习得话语技能过程中,由于知识和知识处理缺陷,他们在不同话语类型中所使用的认知策略是有限的,只能通过采用确实能帮助达到同样目的的认知策略,如重复信息、运用语调而不是概念手段实现主张、提供超量信息弥补语言表达的不清晰、伴随动作、手势等策略,来克服这些缺陷。

4 结束语

作为完整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取效行为长期被边缘化。奥斯汀和塞尔(Austin 1962, Searle 1969)关注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与世界的关系,忽略以言取效与世界的关系。取效行为代表行为的普遍特征,展现了语言目的和应用研究。本文基于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语料,对取效行为进行研究,将有益于建立目的性现象的整体理论。

参考文献

- 刘森林. 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状况实证研究[J]. 外语研究, 2007(5).
- 孙晓曦. 第二语言语用能力的发展[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 周 兢. 重视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J]. 学前教育研

究, 2002.

- Austin, J.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Havad: Hava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Bruner, J. *Child's Talk* [M]. New York: Norton, 1983.
- Crystal, D. *Child Language, Learning and Linguistics: An Overview for the Teaching and Therapeutic Profession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6.
- Elinor, O. B. & B. Schieffelin.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 Hoff-Ginsberg, E. *Language Development* [M].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Levorato, C. M. & V. L. Zammuner. Semantic Discontinuities Introduced by 'but' in Children's Discourse [J]. *Ricerche di Psicologia*, 1984(8).
- Lock, A. *The Guided Reinvention of Language*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2.
- Mac, Whinney B. *The CHILDES Project: Computational Tools for Analyzing Talk* [M]. Hillsdale, NJ: Erlbaum, 1991.
- Mac, Whinney B. & C. E. Snow. The Child Language Data Exchange System: An Update [J].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90(17).
- Ninio, A. & C. Snow. *Pragmatic Development*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 Peccei, J. S. *Child Language* [M]. Beijing: FLTRP, 2000.
- Piaget, J. *Biology and Knowledg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Searle, J.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Searle, J. R. Indirect Speech Acts [A]. In P. Cole & J. Morgan(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 Shotter, J.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A]. In A. Lock (ed.). *Action, Gesture and Symbol* [C].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Wee, L. Singapore English: Phonology [A]. In *A Handbook of Varieties of English. Vol. 1: Phonology* [C].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4.
- Zammuner, V. L. *Speech Production Strategies in Discourse Plann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nquiry* [M]. Hamburg: Buske Verlag, 1981.